

资本积累、城镇化与空间生产

# 资本空间化

杨宇振 著

Spatialization of Capital Yang Yuzhen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Urbanization and Production of Space

东南大学出版社

资本积累、城镇化与空间生产

# 资本空间化

杨宇振 著

Spatializa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Urbanization and Production of Space  
Yang Yuzhen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南京·2016

## 内容提要

本书是笔者对当代中国城乡空间生产的观察、分析和研究,主要由三个关联与递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结合历史与空间维度,讨论全球化格局中的权力、资本与城镇化的关系以及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城乡关系等。第二部分剖析和研究中国城市美化运动、大学城、工业旧址、历史街区、世博会等空间现象,讨论空间现象背后的空间生产机制。第三部分从对“公共空间”的论述出发,阐述和分析资本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多维度的城市设计,论述多元空间属性对于城市设计的影响。

本书可供城市管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乡规划学与城市社会学等专业人员学习与参考,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空间化:资本积累、城镇化与空间生产 / 杨宇振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641-6379-2

I. ①资… II. ①杨… III. ①资本运作—关系—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F299.21②F8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7436号

书 名:资本空间化:资本积累、城镇化与空间生产

著 者:杨宇振

责任编辑:孙惠玉 徐步政

编辑邮箱:894456253@qq.com

文字编辑:李 倩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 编:210096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出 版 人:江建中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排版:南京新洲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700 mm×1000 mm 1/16 印张:20.25 字数:321千

版 印 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6379-2 定价:59.00元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热线:025-83790519 83791830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 序言：空间之间

我在书中多处强调，当下某一空间的状态越来越受制于空间之间的关联，不再是内生性的发展。人是人文意义上的最小空间；由个体人延伸出去，有家庭、机构（如街道、学校、公司、部委等）、城市、区域、国家和地区等。无论哪一个层级尺度的空间，已然不能再是内生性的、在地性的发展，而关联到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互动之中；关联成为本体的一种状态，或者，也可以说，全球资本、信息、知识、技术、劳动力以及商品等关联性的强化，改变着空间的属性。空间的状态存在于各种层级空间之间共同构成的动态变化的复杂关系之中，存在于资本积累、公平正义、日常生活构成的矩阵之中。《资本空间化：资本积累、城镇化与空间生产》就是对这些一揽子问题不同方面的初步思考。

2003年的春天到2005年的冬天，我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广泛的阅读和对于历史、社会、行业发展状况的思考，是那一时期最大的乐趣。大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接触到大卫·哈维的《资本的限度》，引发我在这个知识领域的兴趣。虽然我在清华大学的主要工作是城市历史、文化与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但对于政治、经济等与空间之间关系的兴趣，却逐渐增长而越发不可收拾。2007年冬我到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访学一年，有机会广泛收集和阅读亨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尼尔·史密斯、迈克尔·迪尔、彼得·桑德斯等人的著作。从2008年开始，我逐渐开始撰写这一方面的文章和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在研习过程中发现，相对于西方同行，国内学科间有较强的边界壁垒，这大概与学科划分以及晋升机制（包括项目、基金申报、论文认定等）有关。国内从事相近研究工作的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我从他们的著作或译作（相关译作这几年有快速增长的势头）中受益良多。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同仁的研究工作也是我比较注意的。总体而言，结合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等来讨论物质空间状况的研究，在目前国内的城市规划与建筑学领域中尚是边缘。在这里我要感谢《国际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城市与设计学报》（台湾）、《北京规划建设》、

《城乡规划》(重庆)、《新建筑》、《时代建筑》、《建筑师》等刊物的支持;本书是对过去几年部分文章的整理;除了少数几个地方的标题和文字略有修改,基本保留了原有文章的状态。

在研究过程中,我的兴趣逐渐转向中国早期现代历史。这固然与之前在清华大学的研究工作有关,但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今天的总体状态,很大一部分奠基于早期现代时期对于西方知识和技术等的引介和在地化过程;我们对于这一过程还知晓不多也远远不够。其中涉及知识与技术的来源、人员的构成(作为知识与技术转移的载体)、机构的设置、法律与法规的内容(包括其中体现出来的社会状况)、实践及其问题,以及以上诸多方面的地区差异等。可以说,目前对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来源不甚明了,大部分研究着重于对都市计划案的描述。然而,研究首先的困难存在于对“城市规划”领域的界定(建筑学的历史研究略好一点,因为有其相对明晰的领域和边界)。当下普遍状况是把城市规划作为一种纯物质技术工具来使用和看待,这使其历史溯源与研究颇为尴尬。我更愿意使用“都市市政”一词。在清末民初时期,“市政”是在新空间中的政治、经济、观念、物质等一揽子的实践。我曾经撰写过朱启钤与北京早期都市市政、孙科与现代中国城市规划的创立、沈怡与上海的都市现代化、卢作孚的实业建设与北碚的早期现代化等。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当下。虽然许多西方学者断言,现代性表现的一种,就是决然地与历史断裂;而我以为,研究历史,特别是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是理解我们自身的必需,是理解人类社会复杂性的必需。

我常常在想,我们这一代人是何等幸运与不幸,经历了中国漫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也大概不会有“来者”)的快速城市化时期;我也常常在想,后人会如何看待我们这一时期?本书的文章,是对当下社会和空间状态的一点观察和思考。它们是我试图认识和理解这个快速变化社会的过程记录,也是获得存在感的一种方式。当然它们也还不够成熟,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这里要感谢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徐步政和孙惠玉编辑,几次与他们在南京借开会之后的长谈使我钦佩他们对于出版的认真和敬业。最后,还要谢谢我父亲长期的支持和理解。

杨宇振

# 目录

序言：空间之间 / 1

## 第一部分 资本积累危机与城镇化 / 001

---

权力、资本与空间：中国城市化（1908—2008年）…………… 002

一 城市化的历史脉络 / 004

二 权力、资本与空间：中国城市化历史研究的三个向度 / 007

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城市化过程 / 012

四 作为经验的城市化 / 021

进口替代、企业主义与流动空间：全球化格局中的城市与国家…………… 026

一 不同空间的矛盾：经济创新与国家治理 / 030

二 全球化意识形态及其实践：城市企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 035

三 新自由主义与城市化过程 / 038

四 流动性与认同 / 041

空间疗法：经济危机的空间转移、扩散与新型城镇化…………… 046

一 资本积累危机与推进城市化的四种力量 / 047

二 国家与城市之间：认同与张力 / 053

三 空间疗法：消灭空间异质性及其困境 / 056

“边缘”辨义：兼谈城市边缘景观…………… 058

一 变化的“边缘” / 059

二 作为实践表征的城市边缘景观 / 061

三 之间：创造性的（边缘）景观 / 064

兼容二元:中国县、镇、乡发展的基本判断与路径选择 .....	065
一 结合历史分析的基本判断 / 065	
二 传统农村困境与城市作为新生产方式空间的出现 / 067	
三 兼容二元:县、镇、乡的路径选择 / 074	
歧路:中国早期现代乡村建设理论思辨的历史回顾与借鉴 .....	078
一 新城乡关系与农村问题的浮现 / 079	
二 乡建运动的实践、问题与方法批评 / 081	
三 检讨当代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 086	
从“乡”到“城”:中国早期现代“公共空间”的转型与重构 .....	090
一 近代以来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 / 090	
二 转型与重构中的“公共空间” / 095	
三 近代化中的“公共空间” / 098	
第二部分 空间生产与空间现象 / 101	
<hr/>	
权力、资本与形象:全球化格局中的当代中国城市美化 .....	102
一 城市美化运动的实践与理论概述 / 103	
二 重庆城市“刷城运动”的过程与批判 / 106	
三 全球化格局下的城市美化发生机制 / 113	
四 梦幻与现实之间 / 126	
五 附记 / 128	
围城、造城与空城:大学城与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生产 .....	137
一 围城及其表征 / 137	
二 造城及其机制 / 142	
三 空城及其代价 / 151	
四 造城矛盾及其未来 / 153	
市场与历史: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工业旧址再开发 .....	160
一 产业空间转移与地方历史过程 / 160	
二 大卫·哈维的巴尔的摩解释 / 161	
三 市场与历史 / 163	
四 作为集体记忆的工业建成环境 / 167	
拼贴历史街区磁器口:空间的生产、去地方化与生活状态 .....	170
一 空间生产 / 170	

- 二 去地方化与符号仿真 / 174
- 三 公共空间的品质 / 176
- 四 普遍性状况与地点的消失 / 177

符号的盛宴:全球化时代的建筑图像生产与批判——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记 ..... 181

- 一 全球化与城市大事件生产 / 181
- 二 世博会:全球化时期的上海与媒体景观 / 183
- 三 世博会图像生产与建筑制造 / 187
- 四 在日常生活与图像化陷阱之间 / 190

更更:时空压缩与中国城乡空间极限生产 ..... 192

- 一 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中国城乡空间生产 / 192
- 二 中国城乡物质空间极限生产 / 197
- 三 时空压缩、地景变迁与身体规训 / 202

双村记:农村的困境与介入新农村建设的方式 ..... 205

- 一 回访过程与问题回答 / 207
- 二 远郊型村庄:陈村的问题 / 212
- 三 近郊型村庄:东村的问题 / 217
- 四 农村的困境与新农村建设的三个基本问题 / 220

第三部分 资本空间化与城市设计 / 224

---

空间间性、个体实践与资本积累:新型城镇化中的空间生产 ..... 225

- 一 空间间性 / 226
- 二 个体城镇化实践及其支配要素 / 229
- 三 资本积累与地方生产 / 231
- 四 资本积累与新型城镇化 / 233
- 五 物质空间实践趋势与对策 / 235
- 六 观念之城与日常实践 / 238

产权、空间正义与日常生活:对现代中国城乡规划变迁的探讨 ..... 241

- 一 资本积累危机与城乡规划 / 241
- 二 确定空间产权与促进产权交易 / 248
- 三 空间正义及其时空过程 / 251
- 四 日常生活作为个人与世界之间的介质 / 253



五 可能的路径 / 254	
制度、资本与公共政策:城乡关系变迁与城乡规划转向 .....	258
一 制度安排与城乡关系变迁 / 259	
二 资本积累危机与城乡空间生产 / 261	
三 不仅仅是公共政策 / 263	
资本空间化过程中的城市设计:一个分析性的框架 .....	267
一 关于“城市”的认识 / 268	
二 欧美城市设计历程与理论的另一种解释 / 272	
三 资本的空间化与地方化:早期现代中国的讨论 / 275	
四 从历史到现实:少思多要 / 279	
社会再生产与城市设计:基于空间层级关系的讨论——兼谈城市设计教育 .....	282
一 空间、空间生产者和空间技术 / 284	
二 社会空间层级与城市设计 / 286	
三 空间的艺术 / 292	
分裂的世界:重建经验与抽象之间的关联——写在中国院系调整 60 周年 ...	294
一 公共意识的分裂与移除复杂性的感觉 / 294	
二 在人与世界的复杂性之间搭建关联 / 297	
三 意义的迷茫与焦虑 / 300	
参考文献 / 303	
图表来源 / 311	
后记:房屋、人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 313	

PART ONE

资本积累危机与城镇化

第一部分

## 权力、资本与空间：中国城市化（1908—2008年）

谁都知道致富是一回事，而有知识、勇敢或仁慈是另一回事，研究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富裕，与研究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自由、公正或在文学、艺术、军事、政治方面声名卓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政治经济学原理》，2009年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空间、知识、权力》的一篇访谈录中谈道，18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建筑和城市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所有将政治学当成人之统治艺术的讨论，都加入了一篇或一系列论城市规划、公共设施、卫生以及私人建筑的章节……城市有许多它们自己造成的问题，它们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成为了统治理性的模型而施之于整个国家”（米歇尔·福柯，2001）<sup>1</sup>。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空间政治化趋势显然是伴随着城市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日趋显要而强化；城市成为现代国家政治运行网络的要点，不仅是福柯指出的“统治理性”，也是“工具理性”得以高密度和高效率运行的空间。城市及其空间成为一种工具——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

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空间政治化趋势何时在中国出现？或者，换一种说法，中国的城市在什么时候，因为成为西方“理性”生产的空间，从普遍的乡村肌理中浮现出来，进而变成政治权力欲加以严格控制的工具？什么时候城市在政治变革中，成为权力欲求“大变”的试验空间？城市成为国家谋求现代化[一种首先来自外界而不是内部的压力，一种李鸿章意识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种接受和回应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的“流动性”]的首要空间，进而图强而自立？

1901年，内患外扰的清政府启动了新政改革，加速推进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宪政与地方自治成为政体改革的核心内容，其根本在于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权与自治之间的关系。1905年8月，清朝廷接纳刑部侍郎沈家本等人的奏请，下令奉天和直隶试办地方自治；1909年1月到1910

年2月间,先后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和《府厅州县议会议员选举章程》。这些章程规定各地分设选举产生的议会和董事会,实行民主自治。时梁启超(1999)<sup>227</sup>认为,“集权与自治二者,相依相辅,相维相系,然后一国之政体乃完。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就天下万国比较,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其国基愈巩固,而国民愈文明”。宪政与地方自治成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而关于制度的变迁,钱穆(2001)<sup>5</sup>则提醒,“某一制度之创立,既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必由此项制度之前身……某一制度之消失,也绝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由民政部拟定并获通过、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一月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下称《章程》)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意义,不仅是《章程》作为一个文本,是遭遇困境的中国现实试图与西方宪政模式(经过日本的实验)结合的产物;更是一个象征性的里程碑,标志着在几千年来以农业生产为命脉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城市作为非农业生产的空间第一次正式进入权力变革的核心,由此成为揭开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序幕;福柯指出的具有现代性的城市空间的政治化、理性化开始在中国出现(至少,作为一种集体意识的观念和趋势)。尽管《章程》颁布之后很快就改朝换代,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农业社会中的乡绅文士逐渐加速从乡村往城市移动;作为劳动力的人口逐渐从乡村往城市移动;资本和生产资料加速往城市移动;中国社会关注的重心(作为一种观念的变化)逐渐从乡村往城市移动,从此,“‘乡’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费孝通,1993)<sup>7</sup>。中国城市作为20世纪兴起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空间,开始经历“连接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米歇尔·福柯,2001)<sup>18</sup>,一方面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验和生产的空间,同时也意味着是新旧生产关系与社会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个人经验)激烈冲突的场所;另一方面则是权力获得合法性与资本获得利润必须征服的空间,城市作为国家经济与政治运行的网络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流动空间”——从这一点上来看,城市的现代性与国家的现代性紧密结合在一起。

由此,论述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与以“资本”流动为代表的全球化和具有地方性特点的权力结构关联在一起。本文首先对百年来城市化的历史脉络做一简要回顾,结合罗兹·墨菲(Rhodes Murphy)、威廉·施坚雅

(William G. Skinner)、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对于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三种范式展开分析,进而讨论资本、权力与空间三者间的关系;资本的城市化作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城市化过程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本文再结合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资本城市化”的理论,进一步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城市化的关系,同时应对1978年以来中国三次重要的政策调节展开论述。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无论是权力结构、资本构成、两者在空间上的作用还是空间自身。特别是,当代中国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工业再到信息产业等多种经济模式的共同存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互渗并存、严重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社会演替前所未有的变化、各种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日益浮现,尤其是进入全球化网络带来的机会与风险等,为城市化研究预设了各种盘根错节、相互缠绕的前提。本文是宏观观察基础上的初步研究。

## 一 城市化的历史脉络

表1-1、图1-1是1908—2008这100年间世界、国家(以中国为例)、城市的大事年表及其发展历程示意图。

表1-1 1908—2008年世界、国家、城市大事年表

年份	世界	国家	城市
1908	—	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1911	—	清朝结束,民国成立	—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	—	—
1927	—	南方军阀初步统一中国	—
1930	—	—	颁布第一部《市组织法》
1939—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		颁布第一部《都市计划法》
1949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1973(20世纪70年代后)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新的时期 <sup>①</sup>	—	—
1949—1978	—	计划经济时期	
1989	—	“历史性的界标” <sup>②</sup>	—
1991	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	—	—

年份	世界	国家	城市
1994	—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1997	亚洲金融风暴	—	—
1998	—	—	住房制度改革
2002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 12)		—
2006	—	启动新农村建设,全面取消农业税	
200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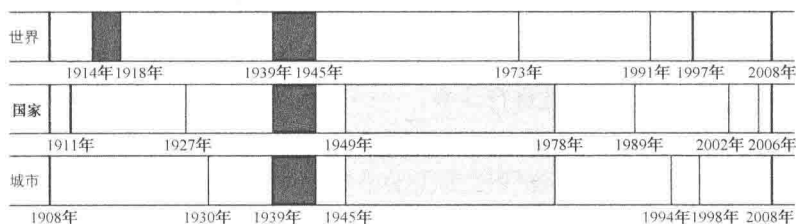


图 1-1 1908—2008 年世界、国家、城市大事发展历程示意图

这些年份与事件的选择显示了理解这个世界多种思考中的一种。表 1-1 本身具有自明性,无需过多言述;但需要强调的是表 1-1 中两两之间的关系:“世界与国家”“国家与城市”。对于前者而言,每一个重要的年份(时段)或事件都意味着国家(王朝)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与更为广泛的地理空间之间(或者是两种或多种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接受、拒绝、冲突或其他),从而影响了国家发展的路径(国家在内与外的张力之间寻找平衡,寻求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也构成世界发展的图景(赵燕菁,2001)<sup>③</sup>。对于后者而言,每一个重要的年份(时段)或事件则意味着权力结构、空间发展模式以及资本扮演角色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近现代以来日趋和“世界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呈正相关关系。城市成为国家处理“世界与国家”关系的首要地理空间,一种日益显要的国家财富;而国家正处在这两组关系的核心位置。

各个不同空间地理单元(世界、国家、城市)之间的复杂关联需要另外的文字进行论述。这不是本文的意图所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这 100 年间,地方城市的空间生产越来越与世界和国家的各种复杂变化交织在一起;地方城市在接纳世界经验的同时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难以想象的、超级庞大的复杂矩阵中的任意一处、任意一个方面的波动,地方城市都将不可避免地感受到这种波动——取决于城

市在这一系统中关联的方式与关联的强度。任意一种试图保持静态平衡的努力都将在日趋强化的巨流网络中被冲垮、摧毁。在这个网络中,流动性代表着财富,代表着力量,代表着一种现代性;流动性的速度与运动的范围代表着财富与力量的多寡和楔入世界的深度。相对的,静止成为一种“逝去”,一种“过时”,一种映照流动性的多数现实,一种流动性获得运动的基面,一种卡斯特认为的“出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流动性可以畅通无阻,民族国家的边界与领域、地方现实的多样性成为与流动性抗衡的力量。大卫·哈维(2003)<sup>145-146</sup>指出,“国家是竭力把自身的意志强加于流动的、空间上开放的资本流通过程的区域性实体。它必须在其边界之内与广泛分布的个人主义派别势力和分裂性的影响、迅速的社会变化、通常依附于资本流通的一切短暂性进行斗争。……国家调节所强加的固定性(稳定性)与资本流动的易变动机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与政治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

城市,就其本身的宿命而言,是属于流动性的,是生而为流动性的;是流动而不是静止,是洋气而不是土气——“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费孝通,1993)<sup>2</sup>;其未来取决于全球化与地方之间的张力,取决于不同空间领域的流动速度。换另外一种论述方式:在某些方面,城市的维度已然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张力与流动速度的差异造就了城市的差异(这一论断,可以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东西部巨大的地区和城市发展不平衡中体验和感受出来),而这种差异则成为民族国家权力核心需要谨慎对待的一个方面。就城市本身而言,从100年前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到1930年的《市组织法》、1939年的《都市计划法》以及日后到现今的多种日趋复杂的行业法规、条例等,都只是自身技术理性日趋深化的过程,“逐步将城市纳入统一的国家法律框架中,强化了‘技术控制’的深度。清末到民国,‘知识来源—知识人才—组织机构与制度—社会主流观念—社会应用—新知识来源’完成了一个‘技术控制’的近代化过程。城市就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形态,在城市结构和空间、城市公共卫生、教育、安全以及建筑形态等方面全面发生了转型,从封建时期的城市形态转变为融入世界技术体系的近代城市”(杨宇振,2006)<sup>280</sup>。从这方面意义上讲,这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与这个宏观结构过程相对应的,是城市规划与建筑学总体上的“理性化”和“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在资本与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发生变化——因为城市是现代技术的主要市场。近30年来,伴随着流动性在城市中的加

大(尤其是流动性对于城市的选择),技术的应用在市场的竞争中产生了快速的跃进。两者都必须面对不平衡发展中存在着价值观念、财富理念、审美意趣等差异巨大的、不同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的现实(相对于过往的平整划一),以及示好不同的技术聘用者或购买者,这产生了与计划经济时期很不同的、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知识领域的巨大分野。由于空间实践尺度的差别,由此带来涉及公共性的差异,城市规划总体上与权力更为接近,在目标上试图成为一种调节各种社群矛盾的“公共政策”(虽然距离目标仍然遥远)。相对的,建筑学与资本更为接近,正日趋成为一种开拓市场的工具;市场为了满足各种不同需求(作为一种欲望),对于“异域情调”“新奇梦幻”“时尚时髦”等的热切追求不可避免地对建筑学的教育与实践形成深刻的影响。

## 二 权力、资本与空间:中国城市化历史研究的三个向度

曼素恩(Susan Mann)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与历史演变》一文中总结了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最重要的三种范式(Paradigm):以墨菲的研究为代表主张地方的发展(Nativist);以施坚雅的研究为代表,主张城乡关系的重建(Reconstructionist);以罗兹曼的研究为代表,提倡西方化城市发展演替传统城市模式(Positivist)。在论证过程中,曼素恩(Mann, 1984)<sup>④</sup>同时还引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瞿宣颖、费孝通、吴文藻、易家铨等)的不同论述和观点来支持论证上述三种范式。这三种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从权力、空间和资本三个不同的向度对中国的社会与城市化进行的观察与研究,虽然三者间并非两两对应的关系。

第一个向度,城市处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关系之中。在中国,无论是历史时期还是当代社会,中央与地方这一组关系最为紧要。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即把“政府的组织”作为首要置放在“考试与选举”“政府赋税制度”和“国防与兵役”之前,显然他认为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选用什么样的人才来进行管理才是“根本大法”。在实际运作中,中央如何有效调用地方积极性与资源?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中国的地理条件与历史过程说明了中央与地方的二元关系(一个常见的比喻是,干与支的问题或者是上与下的问题)始终是影响国家(王朝)政治安全的首要因素。中央集权化是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特点。钱穆(2001)<sup>171</sup>紧接着指出,“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



为期不短……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政治的集权并不必然能够直接转化为经济上的繁荣。特别是近代以来,权力如何能够有效地在各种不同尺度的空间中运行而尽量减少能量的损耗?或者说,权力如何以及能够以什么样的程度在空间中实现意图?尤其是当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已经不再是一种王朝帝国的“天理”,而更趋向于以经济繁荣、民生改善为依托。更明确地说,近代以来,权力必须直面资本的挑战,如何增加国家的财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分配国家积累的财富)?财富的增加如果不能通过对外的掠夺获得,调动内部地方生产的积极性显然是一种必需。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翰林吴士鑑呈请试行地方分治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国家财政,认为“国非财不立,财非民不生……而中国地方财政,夙由守令兼管,催科之外别无作用……东西各国司理财者,于民生之舒蹙,地利之肥瘠,物产之丰绌,贸易制造之进退衰旺,无不通筹并计……中国大患在贫,兹事宜仿效,然非一牧令所能胜任。此财政之宜分治者一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1979)<sup>712</sup>。这也是1908年底、1909年初《章程》颁布的目的之一。

在罗兹曼的研究中,他比对了中、日(后来包括英、俄、法)之间城市化的空间模式。他提出,中国城市等级体系的不均衡,人口和资源的一种“宽底金字塔”(相对于成功现代化的日本的“窄底金字塔”)的空间分布,在少数高等级的大城市与数量巨大的下层乡村城镇之间缺乏中间层次,城市化率低(图1-2)。由此,他将其看成中央权力的无力(Weak),认为缺乏中间层次的城市体系,中央政府难以有效调动资源、抽税以及重新分配剩余,因此造成现代化的困难。在几个国家的比较研究中,罗兹曼认为工业革命前高城市化指标的社会最容易且可以快速进入现代化过程;其结论是,在从低等级向高等级的调动资源中,中国的城市体系毫无疑问是最无效率的网络。

罗兹曼的研究直接将城市化与中央政府整合资源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这一论述,在王朝等级秩序解体、在民族国家走向理性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日趋显示出其意义。在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中,权力需要通过城市作为生产、交换、消费等与乡村不同的功能,一种高效能的积累财富的空间,来获得合法性的基础(虽然不是全部)。由此,在一定的层面,城市化的深度亦